

印度国旗与印度民族国家建构变迁

齐仁达

摘要：国家象征物的确定是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工作之一，而国家象征物的选择与改变则反映的是民族国家建构理念的变迁。印度国旗诞生于反对英国殖民统治斗争期间。1921年甘地主持设计国旗的核心理念是以印穆团结为中心的宗教和谐、教派团结。1931年国大党决议通过的印度国旗反映的是具有甘地色彩的世俗民族主义的民族国家建构理念。1947年印度国旗的形制正式确定，象征着尼赫鲁式国家的建立，其蕴含的民族国家建构理念经历了从甘地世俗民族主义到尼赫鲁世俗民族主义的转变。以国民志愿服务团为代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在独立前就不赞同国大党设计的各版国旗，独立后很长一段时间也拒绝接受印度国旗。但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印度的政治生态发生变化，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接受了印度国旗，并将国旗作为政治动员的重要工具。但印度教民族主义者通过出台2002年《印度国旗准则》对国旗的象征意义进行了再解释。印度国旗的形制虽然未发生变化，但其承载的象征意义发生了变化，标志着印度已由尼赫鲁式国家向印度特性国家的转型。从独立前到独立后，印度国旗的形制和象征意义处于不断流变的进程中，这种流变状态实际上反映了印度民族国家建构的变迁进程。印度国旗不断流变的关键动因则是以穆斯林为代表的宗教少数群体的宗教认同与民族国家认同之间的张力。

关键词：印度国旗；形制；民族国家建构；印度教民族主义；变迁

收稿日期：2021-05-11

作者简介：齐仁达（1984~），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南亚政治与民族问题。

民族国家建构的理想目标是建构具有文化一致性的想象的共同体。安东尼·D·史密斯关于“民族”定义的重要因素即是“拥有共同的神话、历史记忆和大众性公共文化”。^①共同文化进一步将民族国家提升为公民的共同家园和心灵

① 安东尼·D·史密斯著，王娟译：《民族认同》，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52页。

归属，在一定程度上使民族国家可以发挥类似于宗教对心灵的慰藉作用，成为民族国家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建构共同文化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确定统一的国家象征物。安东尼·D·史密斯说：“象征符号（旗帜、货币、国歌、制服、纪念碑和典礼）能够唤起民族成员对共同的历史遗产和文化血缘的情感。”^①印度最高法院的判决说：“国歌、国旗等是国家的世俗象征，代表着对民族和国家最高的忠诚与爱。”^②

印度经历了从“地理”印度、“母亲”印度、“国家”印度到“国族”印度不断流变的历程。^③印度国旗形制和象征意义的变迁就是这一印度民族国家建构进程的见证。印度国旗起源于1921年甘地主持设计的三色旗。1931年三色旗的设计有所变化。1947年印度独立前夕对1931版三色旗又做了新的改动，确定了印度国旗的正式样式。印度独立后，国旗形式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是国旗的政治象征意义经历过一次变动，这次变动表明了印度民族国家建构模型的变化。总体而言，印度的民族国家建构是一个持续的不断发展的过程，印度国旗也处于一个不断流变的进程中。这一进程发展的动力与印度的宗教、种姓、地域等方面的多样性密切相关，尤其是与印度民族国家建构如何解决好穆斯林等宗教少数群体的宗教认同与民族国家认同之间的张力密切相关。

一、反抗殖民统治与印穆团结的双重使命：印度国旗的萌芽

印度国旗的萌芽与印度反抗英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自由的斗争密切相关。1905年，英国殖民统治者宣布分割孟加拉省。这一决定极大地刺激了印度民族情绪，推动印度民族运动在20世纪初达到一轮高潮。1906年，萨钦德拉·普拉萨德·鲍斯（Sachindra Prasad Bose）和苏库马尔·米特拉（Sukumar Mitra）在反对分割孟加拉的运动中设计了一面包含“致敬母亲”（Vande Mataram）字样以及莲花、太阳、新月图案的绿黄红三色国旗。1907年，比凯吉·卡玛夫人（Madam

^① 安东尼·D·史密斯著，王娟译：《民族认同》，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24页。

^② “Union Of India vs Naveen Jindal & Anr on 23 January, 2004”，https://indiankanoon.org/doc/40605/?type=print&_cf_chl_jschl_tk_=5085d77cd96f7208e112f93ea62ff71b6cf35fb6-1608104831-0-AQXVSHAT5zx57NxCvQZX_Utj3ojo7-mXB-rEDTgQAqmwkOFLPX-eU5Yg9Vu1YJwHgg4YBUkfxwg0YtsK6dB1mzDOumXmiyarP_o-clORouuyv2z7yDnRk3ywuHqIbOB1gm6gaSu_y8Ua2gKSove8nLYW4HfAbYpzeXzdGdseNUTrDeYliPPITA2Koyq4G2nczyCEazEkcg6Ut7l8aMJXBkYEBUTdSe7TxZMWR1byZy-TPz9Q4wT909cMy5SNPBuiwLlOEUatgOnr2bTP1Pt9lIiqKyomXpXatFpKryqn73GLpPe6yglcWyd9E7_E-a6lgSUrEhPpof8bem_NpqHc5gIljIKZ-7Xqx2LkHhO7mqWmmmwOgFC71LTefYq7kGQSI9p7EnLKW-NmDo-8axSg（上网时间：2020年12月18日）。

^③ 姜奎奎、贾岩：《从多元到一元：‘印度’概念的当代变迁》，《世界知识》，2020年第21期，第17～19页。

Bhikaiji Cama) 将该旗帜略加修改, 将三色由绿黄红改为橙黄绿, 将新月图案修改为星月图案, 保留了“致敬母亲”字样。1917年, 国大党领导人提拉克(Lokamya Tilak) 和安妮·贝桑特(Annie Besant) 设计了一面包含七星、星月以及米字旗标志的红绿两色旗。^①

殖民地国家在反抗外来统治、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进程中需要民族主义和民族觉醒。民族觉醒包含两个同时进行的过程: 对外认异和对内认同。团结民众、激发民众反抗殖民统治的民族情绪是国旗承载的使命。激发民族情绪的前提是要明确印度民族的定义和范围, 这三面旗帜均明确通过图案和颜色表达了印度的宗教多样性及宗教和谐特别是印穆团结的内涵。^②当然这三面旗帜均未作为正式旗帜使用, 而且与当代印度国旗样式有较大差别, 只能算是印度国旗的萌芽。



二、从印穆团结到去教派化：印度国旗形制的初步确立及其变动

当代印度国旗起源于1921年甘地主持设计的三色旗。由于不合作运动的蓬勃开展, 设计国旗的任务显得紧迫起来。根据甘地的建议, 民族学院(National College) 的平加利·文凯亚(Pingali Venkayya) 设计了象征印穆团结的红绿两色加纺车图案的国旗。^③后甘地又建议增加了白色, 将国旗改为了白绿红三色旗。白色居上、绿色居中、红色居下, 国旗中间还有一架纺车图案。关于三色及其顺序的含义, 甘地在1921年4月13日做过解释: “我建议背景应是白色、绿色和红色”。

^①https://www.constitutionofindia.net/blogs/do_you_know___2_who_suggested_to_inscribe_swastika_in_india_s_national_flag (上网时间: 2020年11月24日)。

^②包容穆斯林、提倡印穆团结不是这一时期印度民族主义思潮的全部, 在众多的印度民族主义版本中还有一股排斥穆斯林的思潮。王伟均《民族国家史的建构与印度教民族主义史学的发端》一文即从民族主义史学与民族国家建构的角度分析了这一时期印度历史学家建构的将穆斯林统治排除在印度传统历史之外的印度民族史观。这一民族史观为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所利用。(王伟均:《民族国家史的建构与印度教民族主义史学的发端》,《南亚东南亚研究》,2020年第6期,第121页。)

^③Sadan Jha, “Challenges in the history of colours: The case of saffron”, *The 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 51, 2 (2014), p.211.

色。白色部分代表着其他所有信仰，数量上最弱的应占据第一的位置，接着是伊斯兰教，印度教的红色排在最后。最强的部分应是最弱部分的保护盾。”^①纺车形象是由来自贾卢德的拉拉·汉斯拉伊（Lala Hansraj of Jullunder）向甘地建议加入的。甘地认为纺车对印度生活的重要性就如空气和水。^②

1921年甘地主导设计的三色旗是当代印度国旗样式的起源。这一旗帜未经印度国大党会议正式认可，但在不合作运动中及之后得到广泛使用。根据印度教徒的认识，吠陀中记载红色是印度教旗帜的色彩；在伊斯兰教中，绿色是伊斯兰教的代表颜色。因此这一旗帜的内涵在于体现宗教团结，与甘地通过不合作运动和基拉发运动倡导印穆团结，以达到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争取印度自由的意图相一致，反映了甘地特色的世俗民族主义理念。但是这一旗帜包含太多的宗教色彩，被指带有教派主义嫌疑。激进的印度教徒要求单纯使用红色旗帜，国民志愿服务团（RSS）明确表示拒绝承认三色旗，锡克教徒等也不满其宗教特色未能体现在旗帜中。这种具有宗教象征意味的国旗形制引发的负面效应随着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逐步放大，威胁了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团结。

1929年12月，印度国大党拉合尔年会通过争取印度完全独立的决议（Purna Swaraj resolution），并规定1930年1月26日为独立日。自1930年始，争取印度独立的新一轮不合作运动在甘地领导下迅速开展起来。^③甘地主持设计的印度国旗在印度独立运动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引发的教派不满情绪也越来越强烈。1929年9月29日，甘地在勒克瑙的演讲中改变了颜色与宗教对应的说法，重新解释了三种颜色的含义。他说：“旗帜的红色象征着牺牲，白色象征着纯洁，绿色象征着希望。三种颜色代表着同一个理想：团结。”^④1930年10月17日，尼赫鲁也在信中向怀疑者澄清国旗的颜色不代表任何群体。^⑤但是仅靠重新解释三种颜色的含义无法消除甘地三色旗帜引发的负面反应。重新设计新国旗的紧迫性日益凸显。

1931年4月2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卡拉奇会议上指定萨达尔·帕特尔、尼赫鲁、毛拉那·阿扎德等七人组成国旗委员会评估现有国旗，设计新国旗样式。该

^① Mohandas Gandhi, *The Collected Works of Mahatma Gandhi*, Vol. 23, New Delhi: Publications Division Government of India, 1999, p.34.

^② Ibid.33 ~ 34.

^③ 林承节：《印度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00~301页。

^④ Mohandas Gandhi, *The Collected Works of Mahatma Gandhi*, Vol. 47, New Delhi: Publications Division Government of India, 1999, p.169.

^⑤ Jawaharlal Nehru, *Selected Works of Jawaharlal Nehru*, First Series: Volume 4, New Delhi: Jawaharlal Nehru Memorial Fu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402.

委员会“一致认为国旗不应包含任何教派意义”，建议使用既能代表印度古老传统，又能为大多数印度人接受的藏红花色（saffron），同时继续保留纺车图案，纺车使用蓝色。^①

藏红花色成为印度国旗颜色有其必然性，它是印度教僧侣法衣的颜色，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来其政治象征意义逐步鲜明。^②但国旗委员会报告建议使用单一的藏红花色国旗的方案遭到强烈地批评，全印国大党委员会（AICC）甚至被称为“全印度教国大党委员会”（All India Hindu Congress Committee）。尼赫鲁不得不对此作出解释，他说单纯使用藏红花色的建议是国旗委员会中的穆斯林成员提出的，而国旗委员会中只有一名穆斯林成员，即毛拉那·阿扎德。^③1931年8月举行的孟买会议上，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否绝了国旗委员会单纯使用藏红花色和纺车图案的国旗设计方案，并提出了新的方案：在1921年甘地三色旗的基础上将红色改为藏红花色，将三色顺序改为藏红花色居上，白色居中，绿色居下，旗帜中间保留了甘地倡导的纺车图案，纺车使用深蓝色。为避免将国旗与宗教联系起来，将藏红花色解释为代表勇气与牺牲（courage and sacrifice），白色代表和平与真理（peace and truth），绿色代表信仰与英雄精神（faith and chivalry），纺车代表人民大众的希望（the hope of the masses）。国大党工作委员会的建议在1931年8月由国大党委员会孟买会议以正式决议形式通过。孟买会议还决定8月30日为国旗日。^④

国大党将有显著争议的红色替换为藏红花色，并且在解释三种颜色的含义时不再强调某种颜色对应某种宗教，目的是避免教派主义的联想，体现世俗民族主义的政治承诺。为了消除藏红花色与印度教相联系的风险，早在1931年4月12日尼赫鲁提出引入藏红花色的建议时，就对藏红花色的含义作了解释：藏红花色是印度的古老颜色，与印度历史上的牺牲精神相关，而且藏红花色是印度女性接受

^①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 “Report of The National Flag Committee”, <https://dspace.gipe.ac.in/xmlui/bitstream/handle/10973/32872/GIPE-009148-03.pdf?sequence=2>（上网时间：2020年11月26日）。saffron 一词或译为橙色、橘黄色，今从《世界知识》2020年第21期《“藏红花色”的莫迪时代》专辑之翻译，译为藏红花色。

^② 一般认为，在印度教中，红色是祭祀的颜色，黄色是普通信众衣服的颜色，藏红花色是印度教僧侣法衣的颜色。关于藏红花色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逐步取代红色成为印度反抗压迫的政治符号的历史，请参考Sadan Jha, “Challenges in the History of Colours: The Case of Saffron”, *The 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 51, 2 (2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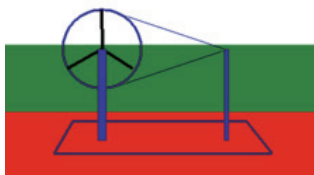
^③ Sadan Jha, “Challenges in the History of Colours: The Case of Saffron”, *The 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 51, 2 (2014), p.220.

^④ All Indian Congress Committee, *The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 1930-34*, Allahabad: J. B. Kiupalani, General Secretary, A. I. C. C., pp.110/111/118.

的颜色。^①

1931年8月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和国大党委员会孟买会议决议通过的新国旗得到了大多数人认可，新国旗成为印度独立运动的象征。但是反对意见和对新国旗进行教派主义解读的误解一直都存在。为此，尼赫鲁、甘地等不得不多次作出澄清。1931年9月26日，尼赫鲁在旁遮普的一场公开演讲中强调新国旗不属于任何国王或皇帝，而是印度成千上万人团结和力量的象征。^②1938年10月24日，针对一些错误言行，甘地强调“这面旗帜不是宗教符号”，“是非暴力和仁慈的象征”。^③1939年6月27日，甘地再次强调“这面旗帜毫无争议地是国旗”，“是简朴、纯洁、统一的象征”。不过面对反对意见，甘地不得不做出妥协，指出在那些存在反对意见的场合，可以暂时不悬挂这面三色旗帜。^④

1921 年印度国旗样式



1931 年印度国旗样式



三、从甘地世俗民族主义到尼赫鲁世俗民族主义：印度国旗的定型

（一）新国旗的确定与印度建国理念的转向

1947年6月3日，蒙巴顿宣布印巴分治方案，印度即将实现独立，设计正式国旗提上议事日程。为此，6月23日印度制宪会议专门成立了国旗特别委员会（Ad hoc Committee on the National Flag），由拉金德·普拉萨德（Rajendra Prasad）任主席。7月15日，国旗特别委员会基本确定了新国旗设计方案，尼赫鲁致信时任印度国大党主席J.B.克里帕拉尼（J.B.Kripalani）说国旗特别委员会建议对现有的1931年国旗进行小的修改，保留三色旗，去掉完整纺车（charkha）形象，仅在

^① Jawaharlal Nehru, *Selected Works of Jawaharlal Nehru*, First Series: Volume 4, New Delhi:Jawaharlal Nehru Memorial Fu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242.

^② Ibid., p.294.

^③ Mohandas Gandhi, *The Collected Works of Mahatma Gandhi*, Vol. 74, New Delhi: Publications Division Government of India, 1999, p.149.

^④ Ibid., pp.68 ~ 69.

国旗白色条带中间保留一个轮子。但此时的轮子并未与阿育王法轮联系起来。^①

7月22日，尼赫鲁代表国旗特别委员会向印度制宪会议提议确定印度国旗的样式。新国旗继承了1931年国旗样式的基本元素，但是将纺车形象改成了阿育王法轮。根据尼赫鲁的动议，印度国旗是长宽比3:2的长方形，由藏红花色（居上）、白色（居中）、深绿（居下）三色组成。国旗正中心白色部分有一个海军蓝色的法轮，法轮形象取材自鹿野苑（Sarnath）的阿育王石柱。^②制宪会议以集体起立致敬的方式一致通过了尼赫鲁提出的国旗设计方案。^③

关于新国旗的含义，尼赫鲁首先指出那些认为国旗代表着某一群体的意见是错误的，国旗设计不附带任何教派意义，这与1931年国旗设计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他指出印度国旗的设计理念：第一，作为国家象征应当美观；第二，应当能代表印度的民族精神和传统。^④关于三颜色的象征意义，因为在国大党1931年决议中已有阐述，尼赫鲁没有多谈。他重点谈了为什么要将甘地纺车改成阿育王法轮。他说纺车形象由甘地提议设计，象征着印度的普通大众和他们的勤劳。去掉纺车是从美观角度考虑的，因为纺车形象不对称。因此保留了纺车中对称的轮子

^① Jawaharlal Nehru, *Selected Works of Jawaharlal Nehru*, Second Series: Volume 3, New Delhi: Jawaharlal Nehru Memorial Fu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15. 该信同时抄送了甘地、帕特尔、拉金德·普拉萨德等人。

^② *Constituent Assembly Debates (Proceedings) (14 July to 31st July 1947, Volume IV)*, <http://164.100.47.132/LssNew/constituent/debates.html> (上网时间: 2020年2月15日), p.747.

^③ 中文文献记载民国第一任驻印大使罗家伦为印度设计了新国旗，据罗家伦回忆：1947年7月30日，罗家伦邀请尼赫鲁等印度政要参加中国大使馆晚宴。宴会中谈及印度新国旗的设计问题。罗家伦在尼赫鲁等一再要求下，建议改甘地纺车为阿育王法轮，并提出三点理由：甘地纺车不易标准化；独立后的印度要走向现代化，不能停留在土纺车层面；印度人民希望看到一个统一的印度，而印度只有阿育王时期曾得到真正的统一，因此建议使用阿育王法轮。尼赫鲁等对罗家伦的意见表示赞同，并最终采用了该设计方案。（毛吉康：《学者罗家伦——民国首任驻印大使》，《世界知识》，2009年第9期，第2页。）此说流行甚广，来源于罗家伦本人回忆。1962年8月21日罗家伦撰写了《印度国旗的制定和我》，发表于《传记文学》1962年第1卷第4期。但是只要我们稍加比照就会发现此说应是罗家伦自夸之词。印度制宪会议已于1947年7月22日开会通过尼赫鲁提出的关于国旗样式的决议。而罗家伦自述向尼赫鲁等建言的时间是7月30日。那么是不是罗家伦自己时间记忆有误呢？罗家伦白云“我为写这篇文章，重翻我使印的日记和笔记，据实写来”。（罗家伦：《印度国旗的制定和我》，《罗家伦先生文存》第8册，台北：“国史馆”、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9年版，第912~913页。）如果照罗家伦所说据日记和笔记撰写回忆，那么不当误记。再查罗家伦7月30日日记，确实当晚有尼赫鲁等人访问罗家伦的记载，但是日记当中只是记载了向印尼官员递交关于印尼华侨问题的函件以及与尼赫鲁等交流罗家伦起草的关于中印文化关系的演讲稿的事情。（罗家伦：《出使印度》，《罗家伦先生文存》第8册，台北：“国史馆”、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9年版，第142页。）所以7月30日的日期误记不是偶然笔误。

^④ *Constituent Assembly Debates (Proceedings) (14 July to 31st July 1947, Volume IV)*, <http://164.100.47.132/LssNew/constituent/debates.html> (上网时间: 2020年2月15日), p.750.

形象，其他部分去掉了。^①

当然选择阿育王法轮肯定不只是美学的考虑。尼赫鲁对此有进一步的阐述：

第一，阿育王法轮象征着印度的传统文化。印度国旗正中的象征物既不是印度教的象征物，也没有采用甘地纺轮，而是选用法轮，有其深刻的考虑。法轮是佛教象征物，阿育王是印度史上第一次基本实现印度统一的帝王，而且是倡导宗教宽容的明君。选用与佛教和阿育王有关的象征物，其目的即在于避免对国旗的印度教色彩过度猜测。这是尼赫鲁将国家与宗教分离的世俗主义承诺的重要体现。^②尼赫鲁说“阿育王法轮是印度古老文化的象征”，印度的文化传统就是“不停滞，不僵化，总是能适应新的发展和新的影响，也总能保持其文化的本质”。印度最伟大的时代是与世界各国保持密切联系的时代，而阿育王时代就是这样一个时代。^③

第二，阿育王法轮象征着印度的和平外交政策。阿育王时代是一个印度与世界各国保持密切联系的时代，是印度史上的国际化时代。印度的使节作为和平、文化与友好的代表而不是帝国主义的被派往各国。^④从这个角度而言，阿育王法轮的选择又是印度对外政策的宣示。

第三，尼赫鲁自己总结新印度国旗的象征意义说：“这不仅是一面象征我们自身自由的旗帜，而且是所有看到它的人自由的象征。”^⑤在8月12日致印度斯坦报（*The Hindustan*）编辑的信中，尼赫鲁对国旗的象征意义谈得更为全面。他说新国旗满足印度对国旗的各种期待，在艺术上是美的，是印度争取自由并获得胜利的象征，是印度普通大众的象征，是印度传统文化和今日活力的象征，“将会指引印度的人民大众迈向进步和解放”。^⑥

新国旗设计方案和尼赫鲁对新国旗的阐释反映了印度民族国家建构的两大动向：第一，坚持世俗主义的解释策略显示了世俗民族主义的建国理念。世俗主义是尼赫鲁建构印度民族国家的核心理念之一。早在1931年谈及设计印度国旗的原

^① *Constituent Assembly Debates (Proceedings) (14 July to 31st July 1947, Volume IV)*, <http://164.100.47.132/LssNew/constituent/debates.html> (上网时间：2020年2月15日)，p.750.

^② 芭芭拉·D.梅特卡夫、托马斯·R.梅特卡夫著，李亚兰、周袁、任筱可译：《剑桥现代印度史》，新星出版社2019年版，第236页。

^③ *Constituent Assembly Debates (Proceedings) (14 July to 31st July 1947, Volume IV)*, <http://164.100.47.132/LssNew/constituent/debates.html> (上网时间：2020年2月15日)，pp.750~751.

^④ *Ibid.*, p.751.

^⑤ *Ibid.*, p.751.

^⑥ Jawaharlal Nehru, *Selected Works of Jawaharlal Nehru*, Second Series: Volume 3, New Delhi: Jawaharlal Nehru Memorial Fu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46~47.

则时，尼赫鲁就强调国大党人的一致意见是“国旗不应有任何教派意义”。^①尼赫鲁制宪会议发言阐述的国旗设计理念不但避免将颜色与教派相联系，而且对阿育王法轮的意义的解释也是从世俗意义上解释的，是世俗主义的重要体现。

第二，印度国旗图案从甘地纺轮到阿育王法轮的转变显示了印度建国理念的微妙变化。这种变化不是偶然的，而是尼赫鲁等印度国大党领导人深思熟虑的结果。尼赫鲁自己就说印度国旗的设计是经过仔细考虑的（very careful consideration）。^②这种深思熟虑反映的是印度建国理念的某种变化。哥廷根大学教授斯里鲁帕·罗伊（Srirupa Roy）认为，从甘地式的纺轮到阿育王法轮的转变代表着当时印度政治经济哲学更大范围内的再定向，即从甘地倡导的分散的、经济自足的村社共和国转向尼赫鲁倡导的工业化的集权的政治体。^③这主要是从甘地与尼赫鲁经济思想上的差异来阐释的，我们还可以从民族国家建构理念的层面进行阐释。

甘地的世俗民族主义主张宗教和谐和宗教团结，特别强调印穆团结，但也主张政治不能脱离宗教而存在，坚持政治应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之上。因此在甘地的民族国家建构理念中，印度民族应是基于宗教基础建立的贯彻宗教和谐、宗教团结理念的民族。当然在甘地思想中，印度民族赖以成长的宗教基础不是我们一般理解的宗教，而是经过甘地再次阐释的宗教。他将宗教称之为真理（truth），说“真理和非暴力是我的信条”。^④这是一种泛化的宗教观。尼赫鲁认为甘地的宗教观“主要属于道德和伦理方面”。^⑤但是尼赫鲁的世俗民族主义是排除了任何宗教基础的，他认为印度民族得以建构成功的基础是印度文化，反对宗教介入政治，主张宗教宽容。尼赫鲁世俗民族主义的根基是与尼赫鲁的宗教观密不可分的。他说：“我不能够以宗教为避难的地方。我宁愿冒惊涛骇浪的风险。对于来世和死后的情形，我也不感兴趣。”^⑥在遗嘱中，他以更加坚定的语气说：“在我死后，不需要为我举行任何宗教仪式。我不相信任何一种这样的仪式……就我而言，我的愿望是将我的一把骨灰撒入没有宗教含义的安拉阿巴德的恒河

① Jawaharlal Nehru, *Selected Works of Jawaharlal Nehru*, First Series: Volume 4, New Delhi:Jawaharlal Nehru Memorial Fu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250.

② Ibid., p.46.

③ Roy Srirupa, “A Symbol of Freedom: The Indian Flag and the Transformations of Nationalism, 1906–2002”,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ume 65 / Issue 03 / August 2006, pp.511 ~ 512.

④ Mahatma Gandhi, *What is Hinduism*, New Delhi: National Book Trust, 1994, p.1.

⑤ 尼赫鲁著，张宝芳译：《尼赫鲁自传》，世界知识社1956年版，第431页。

⑥ 同上，第428页。

里。”^①

对宗教的不同态度表明了尼赫鲁的世俗民族主义与甘地的世俗民族主义的差异。甘地认为国家与宗教密不可分，国家和民族不能脱离宗教而存在。尼赫鲁认为国家是中立的监护人，对各宗教平等地履行监护职责。在尼赫鲁眼中，阿育王是一名具有宗教宽容精神的开明帝王。以阿育王为榜样，建构以开明帝王和开明政府为基础的世俗民族国家，使各宗教在这样的世俗民族国家中和谐相处，无疑是尼赫鲁民族国家建构的理想。因此从纺轮到法轮的转变可以看作是印度建国理念从甘地世俗民族主义向尼赫鲁世俗民族主义的转变。

（二）印度建国理念的转向与甘地的不满

对于印度国旗变动和印度建国理念转向，一名来自海德拉巴的政治活动人士的比喻最为形象。他说“甘地正在被活埋”，“印穆团结、印度斯坦语、土布（khadi）和乡村工业已经被彻底忘记”。^②关于新国旗，他认为阿育王法轮与甘地的纺轮没有任何关系，而且两者并不兼容，因为甘地的纺轮超越于所有宗教之上，是非暴力的标志，而阿育王法轮则是印度教的象征，是象征着暴力的毗湿奴大神的善见神轮（Sudarshan Chakra），将会鼓励印度国内的暴力倾向。^③

对于这种变动和转向，甘地当然会不太满意，但也无可奈何。1947年7月22日，就在印度制宪会议通过国旗设计方案的当天，甘地发表演讲：“今天四个姐妹向我表示祝贺，因为带有轮子的三色旗已经被接受为印度国旗。我看不出任何值得祝贺的地方”，“对我而言，无论保不保留纺车都是一样的。即使他们放弃了纺车，纺车仍将在我的手上和我的心里。”^④8月3日，甘地还说“阿育王法轮和纺轮是不是同一样东西将完全取决于人民的行为”。^⑤8月6日，甘地演讲对纺车被取代一事的不满情绪表达得最为充分，他说：“我必须说如果印度联邦的国旗不包含纺车的形象，我将拒绝向国旗致敬。”^⑥8月12日，尼赫鲁致信印度斯坦报编辑解释说不能认为已经放弃了甘地纺车，国旗中间的阿育王法轮即代表着纺车。^⑦尼赫鲁的这一表态应当就是为了回应甘地的不满情绪。当然甘地的态度

^① 斯坦利·沃尔伯特著，李建欣、张锦冬译：《细数恒河沙：印度通史》，东方出版中心2019年版，第418页。

^② Mohandas Gandhi, *The Collected Works of Mahatma Gandhi*, Vol. 96, New Delhi: Publications Division Government of India, 1999, p.187.

^③ Ibid., p.188.

^④ Ibid., p.112.

^⑤ Ibid., p.188.

^⑥ Ibid., p.196.

^⑦ Jawaharlal Nehru, *Selected Works of Jawaharlal Nehru*, Second Series: Volume 3, New Delhi:Jawaharlal Nehru Memorial Fu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46.

不完全是排斥的。1947年7月27日，甘地将印度国旗的三色解读为象征着多元中的统一，对于法轮图案则说让人联想起阿育王，阿育王是所有信仰的代表，阿育王法轮象征着永恒转动的圣法。^①

甘地最关心的是穆斯林对新国旗的态度，因为这关系到穆斯林愿不愿意真诚地留在印度，实现甘地建构印穆团结的民族国家的梦想。在7月22日的演讲中，他说：“令我非常高兴的是在制宪会议上乔杜里·哈利奎扎曼（Chaudhri Khaliquzzaman）和穆罕默德·萨杜拉（Mohammed Sadullah）向国旗致敬，并宣布效忠国旗。如果确实如此的话，这是个好现象。”^②乔杜里·哈利奎扎曼是穆斯林联盟主要领导人之一，1940年拉合尔决议的副署人。而正是在1940年拉合尔决议中，穆斯林联盟正式提出了基于“两个民族”理论建立穆斯林国家的要求。^③穆罕默德·萨杜拉也参加了1940年穆斯林联盟的拉合尔年会，是拉合尔决议的参与者。两人都是穆斯林群体的领袖人物，曾是“两个民族”理论的拥护者。他们表态拥护和效忠国旗，意味着留在印度的穆斯林同意成为印度民族国家的一员，在世俗民族主义的框架下与印度教徒等群体共存，其象征意味十分明确，所以甘地才会如此关注两人的表态。

（三）制宪会议一致通过印度国旗设计方案表象下的潜流

当然不管甘地对新国旗的态度如何，其他制宪会议成员大部分支持尼赫鲁的动议。大势所趋，非甘地一人可以逆转。7月22日当天其他制宪会议成员的发言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强调印度国旗没有任何教派意义，是所有群体团结的象征，因此印度国旗属于印度的所有群体，属于全体公民。制宪会议成员塞斯·戈文德·达斯（Seth Govind Das）对尼赫鲁的动议和讲话表示完全支持。他强调国旗中的三种颜色与教派无关，当印度国旗从具有教派含义的红白绿三色改为藏红花色、白色和绿色后，印度国大党已经明确宣布这三种颜色与教派无关，新国旗不应被视为教派旗帜。^④来自中央和比拉尔省（C.P. and Berar）的弗兰克·R.安东尼（Frank R. Anthony）说：“今天，这面旗帜是民族的旗帜。它不是任何特定

^① Mohandas Gandhi, *The Collected Works of Mahatma Gandhi*, Vol. 96, New Delhi: Publications Division Government of India, 1999, p.153.

^② *Ibid.*, p.113.

^③ 1947年8月15日午夜举行的印度独立典礼上，乔杜里·哈利奎扎曼还受邀代表印度的穆斯林群体发表讲话。当晚发表正式讲话的共有四人，其他三人是尼赫鲁、拉金德·普拉萨德、S.拉达克里希南。但乔杜里·哈利奎扎曼最终还是于1947年11月移居巴基斯坦。移居巴基斯坦后曾担任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主席、东巴基斯坦总督等职。

^④ *Constituent Assembly Debates (Proceedings) (14 July to 31st July 1947, Volume IV)*, <http://164.100.47.132/LssNew/constituent/debates.html> (上网时间：2020年2月15日)，p.754.

群体的旗帜，而是所有印度人的旗帜。”^①

第二类是宣布代表某一群体支持尼赫鲁提出的国旗设计方案。^②其中穆斯林代表的表态最值得关注。乔杜里·哈利奎扎曼说：“我认为从今天起，每一个将自己看作印度公民的人，无论他是穆斯林、印度教徒还是基督徒，都将为维护今天被接受为印度国旗的这面旗帜的尊严而牺牲。”^③穆罕默德·萨杜拉将藏红花色、白色和绿色解读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共同崇敬的颜色。至于阿育王法轮，则提醒印度联邦的统治者和公民忘记过去、面向未来，继承阿育王的传统，为物质繁荣和精神进步而努力。^④来自迈索尔土邦的穆罕默德·谢里夫（Mohomed Sheriff）将藏红花色、白色、绿色解释为被所有人敬仰的颜色，“无论他们是印度教徒、穆斯林、基督教徒或者袄教徒”，“国旗中心的法轮象征着运动、进步和前进，从美学或其他角度考虑，它都是印度传统和文化的合适代表”。^⑤

第三类比较特殊，以两名来自联合省制宪会议的成员S.拉达克里希南（S.Radhakrishnan）^⑥和贝纳勒斯印度大学校长潘迪特·戈文德·马拉维亚（Pandit Govind Malaviya）为代表。他们发言支持印度国旗方案，但是对国旗的态度与尼赫鲁的又有不同，代表着印度国旗理念的一股潜流。

S.拉达克里希南的发言对新国旗的象征意义有一番系统阐述，他的解释既有与国大党决议和尼赫鲁发言相通之处，又有不同之处。他说：“这面旗帜告诉我们‘永远保持警惕，永远运动，永远前进，为建设自由、富有同情心、尊严、民主的社会而工作。在这个社会里，基督教徒、锡克教徒、穆斯林、印度教徒、佛教徒都将找到安全的庇护所’。”^⑦这与尼赫鲁对国旗象征意义的阐释和尼赫鲁世俗民族主义民族国家建构理念是相通的。具体到对国旗颜色的解释，他说藏红花色代表着自制（self-control）和克己（renunciation）精神；白色是太阳的光

^① *Constituent Assembly Debates (Proceedings) (14 July to 31st July 1947, Volume IV)*, p.763.

^② 来自乌代普尔土邦（Udaipur State）的莫汉·辛格·梅塔（Mohan Sinha Mehta）代表土邦、来自西孟加拉省（West Bengal）的H.C.穆克吉（H. C. Mookherjee）代表基督教徒群体、来自比哈尔省（Bihar）的杰帕尔·辛格（Jaipal Singh）代表土著部落民、来自东旁遮普省（East Punjab）的贾尼·古尔穆克·辛格·穆萨法（Giani Gurmukh Singh Musafar）代表锡克教徒、来自中央和比尔拉省（C.P. & Berar）的H.J.坎德卡尔（H. J. Khandekar）代表被压迫阶级宣布支持新国旗。

^③ *Constituent Assembly Debates (Proceedings) (14 July to 31st July 1947, Volume IV)*, <http://164.100.47.132/LssNew/constituent/debates.html> (上网时间：2020年2月15日)，p.755.

^④ *Ibid.*, pp.759 ~ 760.

^⑤ *Ibid.*, p.758.

^⑥ S.拉达克里希南在印度独立后曾先后担任印度副总统（1952 ~ 1962）、总统（1962 ~ 1967）。

^⑦ *Constituent Assembly Debates (Proceedings) (14 July to 31st July 1947, Volume IV)*, <http://164.100.47.132/LssNew/constituent/debates.html> (上网时间：2020年2月15日)，p.757.

线，意味着光明之路，代表着真理，只有沿着美德之路，才能获得真理和纯洁；绿色代表着我们与土地的关系，我们与其他生命赖以生存的植物的关系，“我们必须绿色的大地上建设我们的天堂”。^①

这些解释均排除了教派主义的解读。但如果进一步解读S.拉达克里希南的发言就会发现其与1931年国大党决议之间的微妙差异。1931年国大党决议将藏红花色解释为勇气与牺牲，白色解释为和平与真理，绿色解释为信仰与英雄精神，纺车解释为人民大众的希望。其中包含一定的甘地色彩，但并不浓厚。而S.拉达克里希南将藏红花色解读为自制和克己，将白色解读为真理和寻找真理之路，则具有更为浓厚的甘地色彩。克己是甘地思想的重要概念，是追求个人完满和实现社会完善，追求真理的重要方法。甘地说：“克己对我们自身和我们灵魂的存在至关重要。”^②克己是印度教和印度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然而甘地将这一思想发扬光大，其本人也成为实践克己理念的榜样。将白色解读为真理和追求真理之路，是更为典型的甘地式的解读思路。在解释阿育王法轮的象征意义时，S.拉达克里希南没有像尼赫鲁那样从阿育王的治国理念、外交政策那样的世俗角度去阐释，而是将阿育王轮解读为永不停息的法轮或达摩之轮。^③对照7月27日甘地认为阿育王法轮象征着永恒转动的圣法，可以看出两人思想的相通之处。

如果说S.拉达克里希南的阐释还基本上基于甘地世俗民族主义，与尼赫鲁的阐释之间的差异还不是特别大的话，潘迪特·戈文德·马拉维亚对印度国旗含义的解释更为激进。他主要是针对那些激进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发言的。激进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认为三色国旗中的印度教色彩过少，主张印度国旗应当单纯使用红色或藏红花色。作为印度教权威的潘迪特·戈文德·马拉维亚将藏红花色、白色、绿色以及阿育王法轮均从印度教角度做了解读，认为这面国旗充满着印度教色彩。^④

S.拉达克里希南和潘迪特·戈文德·马拉维亚的发言代表着印度国旗理念的一股潜流。这股潜流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步崛起为一股改变印度民族国家建构

^① *Constituent Assembly Debates (Proceedings) (14 July to 31st July 1947, Volume IV)*, <http://164.100.47.132/LssNew/constituent/debates.html> (上网时间：2020年2月15日)，pp.756 ~ 757.感谢国际关系学院金铭对译文的指点。

^② Mohandas Gandhi, *The Collected Works of Mahatma Gandhi, Vol. 70*, New Delhi: Publications Division Government of India, 1999, p.304.

^③ *Constituent Assembly Debates (Proceedings) (14 July to 31st July 1947, Volume IV)*, <http://164.100.47.132/LssNew/constituent/debates.html> (上网时间：2020年2月15日)，pp.756 ~ 757.

^④ *Constituent Assembly Debates (Proceedings) (14 July to 31st July 1947, Volume IV)*, <http://164.100.47.132/LssNew/constituent/debates.html> (上网时间：2020年2月15日)，pp.756 ~ 757.根据印度教的说法，克里希纳大神是毗湿奴大神的第八化身。

前进方向的潮流。

1947年制宪会议通过的当代印度国旗样式



四、从尼赫鲁式国家到印度特性国家：印度国旗象征意义的转变

1947年印度国旗的设计体现了尼赫鲁世俗民族主义价值观，是贯彻国家与宗教分离原则的重要体现。尼赫鲁大学教授苏达·派（Sudha Pai）将国旗看作“尼赫鲁式国家（Nehruvian state）的代表”。^①在他看来，尼赫鲁式国家在价值理念上坚持包容的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价值观，而其具体政策则表现为“工业化、命令经济、社会福利和少数群体的平等地位等政策等”。^②

但是随着印度社会的逐步发展，印度的政治面貌也发生了重大变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开始经济转型，社会结构也出现新的变化，一方面是新兴中产阶级的崛起，一方面是宗教、种姓等次国家认同越来越多地介入政治。这些变化在政治上表现为基于地域、种姓和宗教等认同形成的政党的崛起以及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迅猛发展。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变化是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的迅猛发展。印度国旗政治的演变同样折射出印度政治和民族国家建构理念的大转变。以国民志愿服务团和印度人民党为代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对印度三色国旗的态度从不满逐渐转向接受，但在接受其形制的同时又对印度国旗的含义进行了再阐释。这种再阐释包含着民族国家建构理念大转变的意蕴。

国民志愿服务团原本不接受三色旗。1930年1月21日，国民志愿服务团领导人K.B.海德格瓦（K.B. Hedgewar）发布通知要求接受国大党争取印度完全独立的决议，但是在1930年1月26日只能向该组织的藏红花色旗帜（Bhagwa Dhwaj）致敬，拒绝接受甘地主持制定的三色旗。^③国民志愿服务团之所以拒绝接受三色

^① Sudha Pai, “The National Flag”, *India International Centre Quarterly*, Vol. 36, No. 2 (AUTUMN 2009), p.40.

^② Ibid., p.40.

^③ Dharendra K Jha, “To claim RSS association with the tricolour, Sangh chief Mohan Bhagwat plants lie in nationally televised speech”, <https://caravanmagazine.in/history-society/mohan-bhagwat-lie-rss-association-tricolour> (上网时间：2020年12月13日)。

旗，是因为他们认为藏红花色旗帜才是印度的国旗，代表着印度的文化。1946年7月4日，高瓦克在那格浦尔（Nagpur）的集会上称藏红花色旗帜代表了印度文化，是神（God）的象征，整个民族都将向藏红花色旗帜鞠躬致敬。^①制宪会议通过新国旗方案后，国民志愿服务团同样拒绝接受。1947年8月14日，国民志愿服务团机关刊物《组织者》（*Organiser*）对新国旗攻击得非常严厉，说三色旗永远不会得到印度教徒（Hindus）的尊敬，“三”（three）这个词本身就是邪恶，一面有三种颜色的旗帜将会产生非常坏的心理影响，对国家是有害的。^②印度独立后，高瓦克继续严厉批评三色国旗。他说印度国旗的三种颜色被解读为象征着印度教徒、穆斯林和其他群体。在印度教徒之外，穆斯林被单独拿出来，因为在国大党领导人心中没有穆斯林的印度民族是不完整的。而这种将颜色与宗教群体对应的解读是带有教派主义色彩的，国大党因此又将藏红花色解释为牺牲，将白色解释为纯洁，将绿色解释为和平。高瓦克认为这不过是国大党在政治上采取的权宜之计，而不是基于印度古老历史和文化的設計。高瓦克将藏红花色旗帜视为印度的国旗，认为它是印度文化、传统和达摩的象征，是印度民族“最高的、最尊贵的、最真实的象征”。^③

正是基于敌视印度国旗的态度，国民志愿服务团总部一直拒绝悬挂印度国旗。据统计，2000年之前国民志愿服务团总部只在1948年甘地遇刺后才悬挂过一次印度国旗。但是国民志愿服务团的态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步发生变化。国旗被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用于激发印度教徒的热情，获取选举支持。^④特别是自1998年印度人民党正式上台执政后，国民志愿服务团及印度人民党对印度国旗的态度发生了微妙变化。印度人民党上台后不久即以政府名义组织拍摄关于印度国旗的电影。1998年6月博克兰核试验和1999年卡吉尔冲突都成为印度人民党鼓动民族主义的重要机遇，国旗成为宣传民族主义、塑造印度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象征物。^⑤这表明印度人民党在上台执政后，不能再对现有国家体系采取简单的反对态度，而是需要在世俗民族主义国家框架内借助于既有的民族国家象征物建构印度特性（Hindutva）国家，因而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妥协。经历数十年的爱国教育，三色旗已成为印度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象征物，印度人民党及国民志愿服务

① Shamsul Islam, *RSS Primer: Based on 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 Documents*, New Delhi: Pharos Media & Publishing Pvt Ltd, p.11.

② Ibid., pp.11 ~ 12.

③ M.S.Golwalkar, *Bunch of Thoughts*, Bangalore: Vikrama Prakashan, 1966, pp.26 ~ 227/335 ~ 336.

④ Sudha Pai, "The National Flag", *India International Centre Quarterly*, Vol. 36, No. 2 (AUTUMN 2009), p.40.

⑤ Ibid., p.41.

团不能不接受这个事实。当然他们对三色旗不是简单的被动接受，而是根据其价值观对印度国旗的内涵做了新的阐释，其中的关键点是2002年《印度国旗准则》（*Flag Code of India, 2002*）的出台。

2002年《印度国旗准则》的出台与一起源自20世纪90年代的国旗诉讼有关。印度企业家纳文·金达尔（Navin Jindal）在其位于中央邦的企业悬挂了国旗。但是《1950年印度禁止错误使用象征物及名字法案》[*The Emblems and Names (Prevention of Improper Use) Act, 1950*]禁止个人基于任何商业目的使用国旗。^①此后出台的《印度国旗准则》更进一步规定除独立日、共和国日等特定节日外，禁止公民私人悬挂国旗。^②

1994年9月，中央邦地方官员在视察纳文·金达尔的企业时发现该企业悬挂国旗，要求其停止悬挂国旗。纳文·金达尔为此在德里高等法院提起诉讼状告印度联邦政府，认为悬挂印度国旗的禁止性规定侵犯了宪法第19条赋予的言论与表达自由权。悬挂国旗是为了表达对印度国家的热爱，这种言论与表达自由不应受到限制。1995年9月22日，德里高等法院判决支持纳文·金达尔诉讼请求，认为公民个人悬挂国旗不违背《印度国旗准则》。^③1996年，印度联邦政府不服该案判决，又向最高法院提起诉讼。由于涉及印度国旗的系列法规及关于印度宪法问题的解释，且国旗问题关乎民族感情，情况敏感而重要，该案成了审判期限很长的马拉松案。

该案反映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中产阶级崛起引起的政治意识觉醒。中产阶级的政治觉醒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影响力上升交织在一起，对印度政治社会生态产生了重要影响。1998年印度人民党上台执政后决定利用这一变化，为印度教民族主义争取支持力量。纳文·金达尔案正好为印度人民党政府提供

① “THE EMBLEMS AND NAMES (PREVENTION OF IMPROPER USE) ACT, 1950”, <https://www.indiacode.nic.in/bitstream/123456789/1896/1/A1950-12.pdf>, (上网时间：2020年12月20日)。

② J K Gupta, “Standardizing the tricolour that symbolizes the world’s largest democracy”, <https://blog.bis.gov.in:8098/BISBlog/standardizing-the-tricolour-that-symbolizes-the-worlds-largest-democracy/> (上网时间：2020年12月16日)。

③ “Naveen Jindal vs Union Of India on 22 September, 1995”, https://indiankanoon.org/doc/1332036/?__cf_chl_jschl_tk__=878633bef11e4f15e0ff8224daf9d791f192cd49-1608094650-0-AUxNcOKRv1OH0sTNIWLnPWWPIk2_uosBTqP8ewj90VXpH2UBiYnGTGa9ntL8smOYJn5FgoS_0fW3htq7GqawwTiXJ6PE6J_toxCsomX5R3kProQ88HHG1fUd6A2x18SuFtg9cX_uVpChdkYUwDzYzysMzyvT1bNZBkk5EDcrMn3CW7g6lhE4ihi9jzxpFIkKhgrxqP9pJ2G_1K3WxSt6yv2VJw0rr--krOmIgb-1Z9p8txq-vfZ3agpzkT05qFUtIHmHNHG6z4pYby81oP2v1XDMS53z1crsW4xXUm4qHUToEHHD4xw75hkoTAM-gWTe47iX09cZvvilRyl2WJ-Snes4pKz_lh4i_zEJBT6A00orSIFN56oRgFzJeoAQ7VRpA (上网时间：2020年12月16日)。

了机会。2000年10月18日，印度政府根据最高法院的建议成立了跨部门国旗委员会研究国旗悬挂事宜。根据2001年4月该委员会报告的建议，印度政府2002年出台了新的《印度国旗准则》。新准则对之前分散的关于国旗的规定作了整合，明确规定除《1950年印度禁止错误使用象征物及名字法案》和《1971年印度禁止侮辱国家尊严法案》（*The Prevention of Insults to National Honour Act, 1971*）规定的禁止性事项外，“对社会公众、私人组织、教育机构等悬挂国旗不应有任何禁止”。^①基于修订的《印度国旗准则》，2004年1月23日印度最高法院就纳文·金达尔案作出判决。该判决认为公民使用国旗表达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对祖国的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属于宪法保障的言论和表达自由权利，因此支持了纳文·金达尔的诉讼请求。^②

从2002年《印度国旗准则》到2004年印度最高法院判决，印度公民悬挂国旗的严格限制被取消了，国旗不再由政府垄断使用。这一变化推动了印度人民党统治下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同时激发了印度教徒的热情，是印度人民党在大选中获得支持的重要因素，^③并显示出印度人民党、国民志愿服务团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变化：

第一，国民志愿服务团及印度人民党不再公开敌视印度国旗，2002年，国民志愿服务团总部继1948年之后第二次悬挂了国旗。对印度国旗态度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印度教民族主义从强调印度教至上的印度教特性向对其他宗教特别是对伊斯兰教更具包容性的印度特性的转变。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证据是2002年国民志愿服务团成立了穆斯林国民论坛（Muslim Rashtriya Manch）。穆斯林国民论坛专门处理有关穆斯林的工作，表明穆斯林已成为国民志愿服务团的民族国家建构蓝图的一部分。姜景奎、贾岩也认为该组织的成立标志着“印度教民族主义

^① “Flag Code of India”，http://mca.gov.in/Ministry/pdf/FlagCodeIndia14_16082018.pdf（上网时间：2020年12月18日）。

^② “Union Of India vs Naveen Jindal & Anr on 23 January, 2004”，https://indiankanoon.org/doc/40605/?type=print&__cf_chl_jschl_tk__=5085d77cd96f7208e112f93ea62ff71b6cf35fb6-1608104831-0-AQXVSHAT5zx57NxCvQZX_Utj3ojo7-mXB-rEDTgQAqmwkOFLPX-eUb5YG9Vu1YJwHgg4YBUkfxwg0YtsK6dB1mzDOumXmiyarpO_o-clORouuyv2z7yDnRk3ywuHqlbOB1gm6gaSu_y8Ua2gKSove8nLYW4HfAbYpzeXzdGdseNUtRDeYliPPITA2Koyq4G2ncezyCEazEkcg6Ut7I8aMJXBkYEBUTdSe7TxZMWR1byZy-TPz9Q4wT909cMy5SNPBuiwLlOFUatgOnr2bTP1Pt9IliqKyomXpXatFpKryqn73GLpPe6yglIcWyd9E7_E-a6IgSUretHpoF8bem_NpqHc5glIjKZ-7Xqx2LkHhO7mqWmmmwOgFC71LTeFYq7kGQSI9p7EnLKW-NmDo-8axSg（上网时间：2020年12月18日）。

^③ Sudha Pai, “The National Flag” *India International Centre Quarterly*, Vol. 36, No. 2 (AUTUMN 2009), p.40.

势力对穆斯林群体系统整合的开始”。^①

第二，印度教民族主义对印度国旗的态度不是简单接受，而是对国旗的含义进行了再阐释。这种阐释显示出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变化不是对尼赫鲁世俗民族主义的简单妥协，而是具有印度教民族主义自身特色的变化。关于印度国旗象征意义的权威阐释是1931年国大党孟买会议的决议文件和尼赫鲁1947年7月22日的制宪会议发言。国大党决议文件主要解释国旗颜色的象征意义，其解释为国大党所继承。尼赫鲁发言主要谈为什么要将甘地式纺车替换为阿育王法轮。两份材料的核心意涵是坚持世俗民族主义，避免对国旗颜色和图案做出教派主义的解读。印度独立后关于印度国旗的宣传材料基本是基于这两份材料的精神形成的。其他制宪会议成员均对印度国旗设计方案表示支持，但是一些成员发言对国旗象征意义的解读并不与尼赫鲁的世俗民族主义相一致，最具代表性的就是S.拉达克里希南的发言。

2002年《印度国旗准则》在前言部分专门论述了印度国旗的具体内涵，而最值得玩味的是该准则没有引用尼赫鲁和国大党决议的表述，而是引用了S.拉达克里希南关于印度国旗的解释。^②S.拉达克里希南说：“藏红花色象征着无私克己（renunciation of disinterestedness）。我们的领导人必须漠视物质享受，献身于工作。中间的白色象征着光，引导我们行为的真理之路。绿色表示我们与土地的关系，我们与其他所有生命均赖以生存的植物的关系。白色中间的阿育王轮是法轮。真理、达摩或品行应成为在这面旗帜下工作的人们的指导原则。法轮象征着运动……象征着和平改变的活力。”^③作为印度国旗问题的权威文件，2002年《印度国旗准则》在阐述印度国旗的意义时回避尼赫鲁而援引S.拉达克里希南，一方面因为S.拉达克里希南是印度知名学者，又曾担任副总统、总统，其论述的权威性不逊于尼赫鲁。更重要的是S.拉达克里希南表述的思想更多体现了印度传统文化乃至印度教的精神。这种精神更多地具有甘地特色，与印度教民族主义具

^① 姜景奎、贾岩：《从多元到一元：印度概念的当代变迁》，《世界知识》，2020年第21期，第19页。贾岩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进入21世纪后，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在坚持强调“祖地”概念的同时，弱化了对“圣地”概念的执着，为穆斯林和基督教徒认同“印度教特性”降低了门槛。（贾岩：《“印度母亲”与印度的民族主义想象》，《南亚东南亚研究》，2020年第3期，第122页。）印度教民族主义者降低穆斯林认同“印度教特性”的门槛的判断与本文所论述的2002年《印度国旗准则》标志着印度教民族主义致力建构的印度民族国家对穆斯林的态度更具包容性的判断是一致的。

^② 2002年《印度国旗准则》引用S.拉达克里希南制宪会议发言与制宪会议辩论的会议记录文字表述上有一定差异，但是其精神则是完全一致的。至于存在文字差异的原因可能是记录人不同，也可能是2002年《印度国旗准则》的引用对原件做了简化处理。

^③ “Flag Code of India,2002”,https://www.mca.gov.in/Ministry/pdf/FlagCodeIndia14_16082018.pdf (上网时间：2020年11月24日)。

有相通之处。

印度教民族主义能够吸纳包容这种精神是印度教民族主义自身发展变化的结果。独立后，高瓦克对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解释已经从绝对的印度教至上向强调对祖国的献身精神、对同胞的友爱之情以及“因为共同的文化、遗产、共同的历史、传统，共同的理想和热望而产生的共同的民族生活的意识”三位一体的价值观转变。^①这种转变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已从宗教民族主义转向了文化民族主义（Cultural nationalism）。1996年、1998年印度人民党的竞选纲领均将印度特性等同于文化民族主义。1998年印度人民党上台执政后，文化民族主义形成印度人民党执政的重要理论基础。印度人民党和国民志愿服务团对国旗态度的转变就是印度教民族主义由印度教至上的印度特性向更具包容性的印度特性转变的政策产物。这种转变使得国民志愿服务团与印度人民党在意识形态上与甘地主义更为接近。

国民志愿服务团和印度人民党的这种政策转变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得到了后续领导人的继承和认可。2004年印度人民党大选失败。为激励士气，2004年9月25日至2005年2月11日，印度人民党组织了国旗游行（Tiranga Yatra）。游行从卡纳塔克邦的胡布利（Hubli）开始，在旁遮普邦的贾利安瓦拉·巴格（Jallianwala Bagh）结束。^②如果不是对国旗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很难想象印度人民党会组织这样的国旗游行。最堪品味的是游行开始地是胡布利的一处穆斯林户外公共祈祷地（Idgah Maidan）。当地穆斯林宣称两百多年前已将该地作为祈祷场所，但印度教徒不予接受。自20世纪90年代，当地的印度教徒经常在独立日和共和国日期间将国旗悬挂在该地并引发教派冲突。^③印度人民党选择这样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地点反映出其民族国家建构理念：穆斯林是印度民族国家的成员，但是其宗教认同应服从于民族国家认同。

2018年9月17日，国民志愿服务团领导人莫汉·帕戈瓦特（Mohan Bhagwat）在关于印度的未来的重要演讲中，说国大党通过自治决议时，K.B.海德格瓦要求该组织成员高举三色旗游行。^④这当然是歪曲了事实，但是也从侧面反映了莫汉·帕戈瓦特对印度国旗的支持态度。2019年、2020年的8月15日，莫汉·帕戈

^① M.S.Golwalkar, *Bunch of Thoughts*, Bangalore: Vikrama Prakashan, 1966, pp.134~135.

^② Sudha Pai, “The National Flag”, *India International Centre Quarterly*, Vol. 36, No. 2 (AUTUMN 2009), p.43.

^③ *Ibid.*, p.43.

^④ Dhirendra K. Jha, “To claim RSS association with the tricolour, Sangh chief Mohan Bhagwat plants lie in nationally televised speech”, <https://caravanmagazine.in/history-society/mohan-bhagwat-lie-rss-association-tricolour> (上网时间：2020年12月13日)。

瓦特连续两年在国民志愿服务团总部升起印度国旗。

五、余论

总体而言，一部印度国旗的历史就是印度民族国家建构理念发展变化的历史，也是印度的穆斯林政策史。1921年甘地主持设计的国旗核心理念是以印穆团结为中心的宗教和谐、教派团结。1931年国大党决议通过的印度国旗反映的是具有甘地色彩的世俗民族主义的民族国家建构理念。1947年制宪会议确定的正式国旗进一步由甘地的世俗民族主义向尼赫鲁世俗民族主义的转型。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政治社会生态发生巨大变化。以2002年《印度国旗准则》为标志，印度人民党和国民志愿服务团为代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发生了文化民族主义转型，对穆斯林等宗教少数群体更具包容性。这种转型在2014年后莫迪政府时代仍然继续延续。2014年后，印度人民党牢牢占据印度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印度的民族国家建构模型由尼赫鲁式国家向印度特性国家的转型日益明显。一言以蔽之，独立前印度国旗的内涵逐步由甘地世俗民族主义向尼赫鲁世俗民族主义转变；独立后印度国旗的内涵逐步由尼赫鲁世俗民族主义向印度教民族主义转变，不过吊诡的是印度教民族主义本身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更多具有了甘地世俗民族主义的色彩。

印度国旗经历1906年、1921年、1931年、1947年、2002年等多次变化，穆斯林始终是印度国旗设计问题的关键考虑因素，也是印度国旗变迁的重要动因。印度穆斯林的命运在印度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起起伏伏。未来在经历转型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的统治下，印度穆斯林能否成功适应，调试宗教认同与民族国家认同之间的张力，则是一个仍待认真观察的问题。这一问题的答案既关乎印度穆斯林的命运，也关乎印度民族国家建构能否行稳致远，其成败得失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民族国家建构同样会有启示意义。

[责任编辑：李丽]